

書名：《朝野與雅俗：宋真宗至高宗朝詞壇生態與詞體雅化研究》

作者：趙惠俊

出版：復旦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年7月

雅與俗是中國傳統詩學的重要範疇，起源于先秦儒家樂論。宋代之前，雅俗觀念已經流行于音樂、文學領域，配合詞體文學演唱的隋唐燕樂與中原清商樂構成了一組音樂層面的雅俗對立。而詞體最初是作為流行音樂最先在世俗社會傳播開來，後於宮廷與士大夫間產生影響，於是又出現社會階層領域的雅俗對立。一部詞史就是雅化尊體、雅俗的對立與交融貫穿，由此詞體雅化便成為詞學研究的核心問題，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關注，如謝桃坊《南宋雅詞辨原》、吳蓓《南宋雅詞的特質與時代因素》、黃雅莉《宋詞雅化的發展與嬗變：以柳、周、姜、吳為核心》、劉少雄《南宋姜吳典雅詞派相關詞學論題之探討》等論著相繼問世。

復旦大學趙惠俊博士致力於詞體雅化的研究，成果集中體現於近期出版的《朝野與雅俗：宋真宗至高宗朝詞壇生態與詞體雅化研究》一書中。

一

作者在緒論中指出，如今對詞體雅化的認識主要可以概括為兩個核心與一條脈絡，兩個核心分別是詞體演化的發端人物蘇軾與南宋雅詞的宗主姜夔，一條脈絡則是“柳永—周邦彥—姜夔—吳文英”的詞體演化研究綫索。但是這三種認識並不是對詞體雅化作通盤式的宏觀把握後得出的整體結論，存在一定程度的斷裂。將蘇軾視為詞體雅化的發端主要是把世俗社會與士大夫社會的對立作為考察詞體雅化的落腳點，從而將“雅”定義為文人士大夫組成的上

層文化圈的審美風尚與文藝追求,將詞體雅化理解為世俗歌詞由民間到士大夫社會的文人化、士大夫化的尊體過程,因此,具備為詞體“指出向上一路”詞史地位的蘇軾便成了詞體雅化的核心人物,因為東坡詞同時符合士大夫作者與詩人句法的雙重條件。而姜夔成為另一位雅詞的核心人物則是源于具有濃郁傳統詞學色彩的“風雅詞派”論述。蘇軾與姜夔被推為詞體雅化的核心人物眉目清晰,亦有相對充足的道理,但放在一起考察就可以明顯看到這二者的“雅”其實有著不同的內涵,因此當整合二者,欲梳理出一條完整的詞體雅化脈絡時,就會產生前後無法連接的困惑。按照“擴大其社會作用並寓以詩人句法”的標準理解雅詞,承繼蘇軾的應當為辛棄疾,如若以“清空騷雅”的標準追溯姜夔的遠祖,周邦彥應該是比蘇軾更為合適的人選,如此並不能構建起蘇軾—姜夔的詞體雅化演進脈絡。

由此可見,詞體雅化脈絡斷裂的核心原因在於雅詞的概念並不唯一,有著寬泛駁雜的內涵,某條單獨的脈絡也就不足以解釋全部。在詞體由俗到雅的大發展趨勢下,每一位詞人都或多或少地涉足於雅化,相關詞作其實都可以稱為雅詞,因此簡單寬泛的雅詞定性是沒有意義的。無論是對於理解詞作與詞人,還是對於探究詞體雅化進程,都毫無幫助,只有回歸到具體歷史語境中去,探究某位詞人在什麼立場什麼基礎上進行詞體雅化,詞人各自選擇了雅詞內涵中的哪些元素,承擔起哪條雅化路徑上的任務,才能全面揭示詞體的雅化歷程,才能看出姜夔以下的南宋雅詞是如何承繼前代雅化成果而出現的。無論是詞體雅化還是詞史演進都不是一條單向綫性的框架足以概述的,而需要建構多維多層級的模型方能統攝,作者在本書中即希望借探討詞壇生態儘量還原立體的時空,由此逐一清理不同維度、不同層級的雅詞面相是怎樣產生和發展的。

二

本書撰寫最初的動機是試圖“縫合產生于蘇軾與姜夔之間的詞體雅化脈絡斷裂”,儘量全面地理解動態多元的詞體雅化過程,相應地,在研究範圍上,

自然就落在徽宗與高宗兩朝詞壇生態與詞史發展的考察上，並且需要將二者視作一個整體的時段進行研究，才能更好地探討“詞分南北”之外的南北承續。書中重點討論雅詞的各項內涵是如何在北宋確立發展，並在高宗朝碰撞交融，最終形成雅詞共識的。但徽宗朝的很多現象往往在同樣大規模運用禮樂統治手段的真宗朝即已萌芽，因此討論徽宗朝的政治與文化，很多時候會溯源至真宗朝，而尋找柳蘇之間的相承演變關係，也是縫合傳統雅化脈絡斷裂的必要前提，是以作者的論述是從雅詞思潮的第一次高峰真宗——仁宗朝開始。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認為，對於詞壇生態的探討離不開解釋框架的幫助，即有序的歸類。歸類的行為必然會產生相互對立的範疇或概念，但任何一組對立都是相對的，二者在差異之外也存在密切的聯繫，作者採用了多組解釋框架或歸類方式觀照同一個問題，他們可以互相照見各自視閥中的盲區，使得研究者能夠看到儘量全面的現象。本書便採取這種方式應對單純的南北或婉豪之分，借鑒村上哲見“官僚文人”與“專業文人”的身分區分，兩宋黨爭視閥下的朝野空間之離立，詞學傳統概念“令曲”“慢詞”之別，“唐宋變革”論中的貴族士大夫到科舉士大夫的轉變以及士大夫——庶民的社會分層等概念，儘量在多維度視角的考察下還原當日詞壇生態，由此對詞體雅化問題取得相對全面與深入的思考。

可見，問題的提出即在於宋人雅詞內涵具有多元性，因此作者在研究伊始就將宋人雅詞話語的意蘊分為五種類型，即音樂系統與聲律層面的雅樂，文本內容層面的頌雅、騷雅與儒雅，以及文本字面層面的雅辭，這代表了詞體雅化的五種方向。雅詞之雅可分為樂雅、頌雅、騷雅、儒雅、雅辭等多種，那麼顯然任何一位詞家乃至一個詞人羣體皆無法獨立承擔如此紛繁的雅化任務，雅詞的源頭必須是多流並進的樣態。

三

本書採用了多維視角，不拘於時代為序，以名家、詞派分類的研究傳統，注重對詞體雅化脈絡的描述、相關詞人雅化貢獻的認識，始終圍繞書名中“朝野”

“雅俗”這兩組相互對立的範疇展開,呈經緯交叉之勢,如一張細網穩穩圈住真宗至高宗朝詞壇,借此考察歷時的詞史與共時的詞壇生態。從章節的結構安排就可以看出作者獨特的研究視角與極具思辨力的研究方法。

全書共分五章,第一章《雅俗之間:宴飲活動與京城歌詞形態》與第二章《江湖雅意:地方詞壇與士大夫的詞體研究》是一組對立。宴飲唱和是雅化最初的發生空間,不同宴飲主人的審美趣味與歌詞喜好,形成了形態各異的雅化路徑與雅詞傳統。在帝制時代,京城是詞體寫作與詞體雅化的文學中心,作者以兩組相互對立的範疇——宴飲主體的身分與歌詞文體為經緯綫索,考察了令曲、慢詞的雅化契機。首先,在唐宋轉型之際,宴飲活動的主體由門閥士大夫轉向軍功貴戚,京城私第宴飲間的歌詞形態以令曲為主,文本形態呈現雅俗交錯的穠豔靡麗。國家性宴飲與帝王賜宴則是天下太平的象徵,賦頌太平之詞對慢詞發展影響深遠。流行於宋初市井間的慢詞被按照歌功頌德的文本形態進行雅化改造,士大夫在禮樂活動與帝王意志下逐漸參與慢詞寫作,為詞體文學帶來宮廷雅化契機。地方的文學生態則與京城迥異,宴飲活動的中心為科舉士大夫,地方宴飲就具備了士大夫交際場合的功能,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周濟有言:“北宋有無調之詞以應歌,南宋有無調之詞以應社。”(周濟《介存庵論詞雜著》,《詞話叢編》,中華書局,1989年,頁1629)應歌之詞指酒筵歌席之際付諸歌女演唱的即興歌詞創作,應社之詞則是文人雅集、詞社的分題賦詠,這正是南北詞風典型範式的差異關節,即創作圍繞的中心羣體從貴戚轉變為士大夫。地方宴飲場合下創作的歌詞並非簡單地付諸歌女以侑觴,還有士大夫之間交際迎合的政治目的,是一種應酬之詞,使得士大夫作者與詞體寫作發生交會,出現了與京城不一樣的詞體雅化路徑,以蘇軾為典範的儒雅之詞也在這片空間內產生。在第二章中,作者又引出了“朝野”這一組對立概念,在中國文學史上,朝野離立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文學格局。起源于中唐之際的詞體文學,從發生伊始就帶有深刻的朝野離立烙印,北宋前期詞承繼了萌芽於花間時代的朝野城市差異,並結合相關城市在北宋時代的經濟狀況、空間環境與文化感覺等形成了新的朝野城市意象,初步形成了朝野不同的詞情詞貌。作者選取了開封、兩浙與洛陽作為朝野城市的典型,從地方文學生態的角度描述詞體朝

野離立的現象,引出土大夫詞人如何承繼地方詞體傳統並進行詞體雅化工作這一關鍵問題。

第三、四章著眼于徽宗朝詞壇,作者以“升平”時代領起,關注點分別在京城雅詞與地方詞學生態。大晟樂與大晟詞人是徽宗詞壇最鮮明的標誌,大晟雅樂是重要的復歸三代禮樂建設工程,歌詞更易受到徽宗文藝理念的左右,雅詞的體式與樣制在政和之後的京城空間被完全建立起來。在徽宗詞壇,代文士立言、代帝王立言、代歌妓立言構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這三種詞路在宣政年間都獲得了繁榮與定型,已經發展成為與北宋主流詞壇有別的新樣態,基本具備了南宋詞的各種特徵。如在頌體之詞與羈旅行役之詞方面將“屯田家法”開拓得更加複雜與精緻,並積極在詞中展現新時代帝王富貴而風雅的日常生活。然而,雅詞的終極指歸是表現士大夫的個人情感與生活,這一點表現在逐出京城的在野士大夫詞人身上,他們嘗試將身世之感打入豔情之法,灌入令曲與慢詞,使其能夠自由表達士大夫的意趣與日常生活。樣制與意趣正是南宋雅詞的一體兩面,二者正是由徽宗朝朝野兩方分別確立的。

按照徽宗的規劃,禮樂制度要按照“上以風化下”的途徑逐漸普及到地方,但遇到了較強的阻力,文藝領域沒有向京城流行風尚靠攏。作者在此章著意論述徽宗朝地方生態與詞體寫作的日常化傾向,認識填詞成為士大夫日常生活方式的過程,有助於理解詞體干預政治生活的緣起、特點與實質。作者將切入點安排在文人唱和與謫居生活寫作,隨著宋詩的唱和形態被引入詞體,詞體唱和也經歷了由酒筵歌席之際的當下應酬到突破時空所限的擴容過程。作者主要圍繞文本形態與唱和形態,全面探究其文學唱和的各種形態與功能。謫居生活也是體現詞體“日常化”寫作的典型,作者關注士大夫詞人隨著朝野轉換發生的詞體寫作變化,探究他們用怎樣的方式填制“日常化”詞作。隨著詞體日常化轉型的完成,填詞成為了士大夫日常生活之一,不同的生活狀態顯然會產生與之相符的詞風與體制,題材也會隨著生活內容的豐富而擴展,徽宗朝地方雅詞寫作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基本建構起南渡後的詞壇格局。

在第五章中,作者試圖在詞分南北與婉約豪放架構之外探究高宗詞壇對徽宗詞壇的異動與承繼。作者在本章選取了四個較為微觀的角度,以點及面

考察高宗朝詞壇的秩序重建。如南渡前後兩浙士大夫的日常化雅詞寫作,作者選取毛滂、呂渭老、葉夢得等占籍兩浙或有兩浙爲官經歷的士大夫,更全面的展示南渡之後兩浙地區雖從地方行政單位轉型爲京畿核心區域,但此地的生活方式與詞體寫作仍然得以承繼與保留。又如紹興合議後的禮樂重舉與頌體之詞的復歸,以專業詞人爲主的京城詞風再次復歸,對雅詞的探索也重新展開。士大夫詞人在詞作與詞論兩方面都做出努力,如王灼《碧雞漫志》,強調了上承樂府詩教的詞源觀念,這一點是高宗朝詞壇的共識,可見朝野雙方的爭奪實際上將詞體雅化推入了新的層面,雙方各自的雅化任務都已經完成。

四

唐宋詞體發軔於世俗里巷,而與之相配合的音樂大量來源於西域,因此詞體的由俗入雅就成爲貫穿詞史的主題。通讀全書,作者詩中始終緊扣詞體在字面、內容、章法、音樂、詞人等多重領域共同完成的由胡入華、由俗入雅的尊體過程,在研究視角與學術觀點上不囿於陳見,屢出新意,主要體現在:

其一,重構詞體雅化脈絡,以實證研究爲基礎,立體化、動態化呈現共時的詞壇生態,盡可能的還原詞史面貌。比如,“以詩爲詞”是通貫詞史的命題,常用以概括詞人的雅化嘗試,但入詞的詩體是隨著詞史的發展而變化的。詞體雅化發展到這一階段,產生兩種相對的觀念:一是將樂府詩教傳統全面融於詞體,詞從創作到批評與詩愈發趨同;二是強調詞體的文體個性與自我傳統,不因“以詩爲詞”的雅化手段而丟棄詞體的本來屬性,如作爲音樂文學的音律特徵、主情致的書寫傳統以及精工的章法結構。作者認爲“詞別是一家”與“以詩爲詞”並不矛盾,而是詞體雅化的多元路徑相互碰撞而成的一條雅詞趨勢,是一種動態的平衡。

其二,著眼詞學研究的關鍵環節與現有研究的薄弱環節。詞體雅化是詞學研究經久不衰的選題之一,而前賢們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士大夫詞人的詞學觀與填詞實踐,以經典大家串聯詞史,對於宮廷宴飲活動與專業詞人的雅化作用涉獵甚少。作者用大篇幅研究宋代宮廷雅樂,作出了積極的嘗試。北宋宮廷

音樂機構具有雅俗混雜的性質，當真宗首次大舉禮樂之時，慢曲便獲得了雅化契機，至徽宗朝，不僅京城詞人羣體創作了精工的慢詞樣制，而且成功製作的大晟雅樂更為詞壇提供了官方音樂標準，南宋歌詞之聲律曲調皆由大晟而出。在詞體“婉約豪放”“詞分南北”的二元對立框架下，找尋其中的政治因素，在社會歷史與文體內在生命間尋找聯繫，既不因社會歷史變遷忽略文體自身發展規律，也不過分強調文體特性而不顧文體置身其間的社會歷史變遷。

其三，在研究方法上，融合社會歷史模式與文體內在生命模式。強調知人論世的中國傳統文論主要以社會歷史模式建構批評話語，“詞分南北”便是典型，即以王朝更替作為詞史分期斷綫，這種單一的敘述模式遮蔽了詞體自身的內在邏輯，將完整連貫的“徽宗—欽宗—高宗”三朝詞史脈絡割裂為二。作者極力避免單一模式敘述，從而揭示徽宗朝在詞史脈絡中奠定傳統的經典地位，亦從身分轉換的角度分析南宋詞人多元化的詞體寫作。

在學術研究日益精細的今天，研究者若想超越前人的研究，需要培養文史哲多學科交叉研究的能力，並建構獨特的方法論，本書就是一個很好的樣本，為文學研究的深入提供了重要的借鑒。不過本書仍然存在一些局限，誠如作者所言，通篇以朝野離立為敘述框架，沿用了以黨爭把握宋代文史脈絡的模式，與“婉約豪放”“詞分南北”一樣是不完整的二元對立。對於宋代文學研究來說，突破黨爭視閥的思維模式，重新劃分並定義意義單元，應是尋覓新現象、獲得新理解認識的一種路徑。

（作者：浙江大學人文學院 胡秋妍）